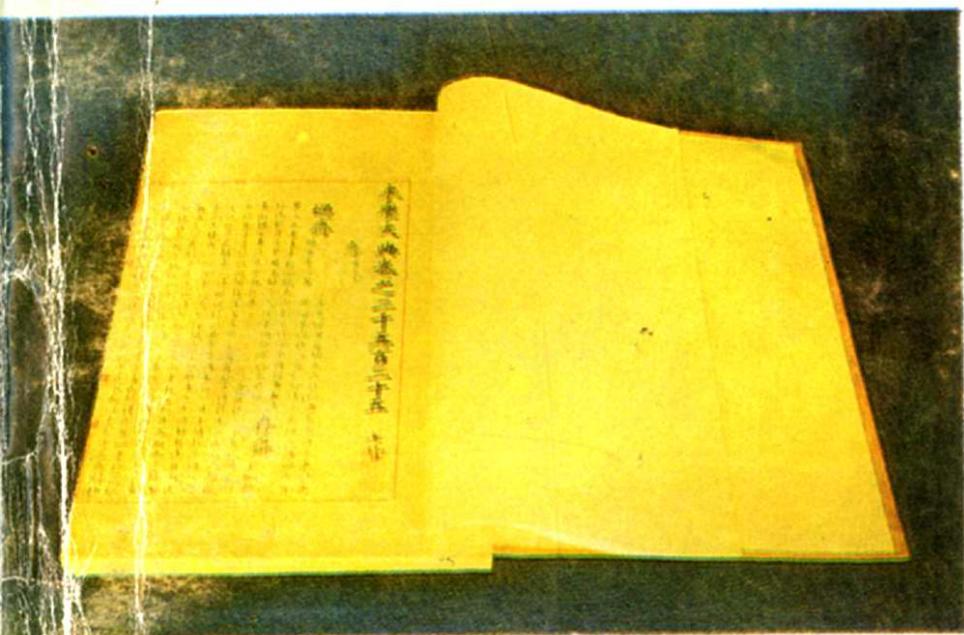


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

100301

北京出版史志



第10辑

北京出版社

- 清以前北京翻译图书出版举要
- 北京古代出版机构考述(中)
- 软科学图书在北京地区的崛起
- 对北京出版社选题管理的片断回忆
- 《高山下的花环》的组稿编辑情况
- 《创业史》出版的前前后后

BEIJING CHUBAN SHIZHI



校 雉 俑

目 录

北京出版史志

第 14 辑

-
- 1977 - 1979 年北京出版界拨乱反正纪事 方厚枢 (1)
记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汪家熔 (20)
-

·京华出版史事·

- 建国后京版古籍出版述略 陈培荣 (36)
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 肖东发 袁逸 (55)
50 年代我国中小比例尺地图编
绘出版工作整顿改造记略 周岩 (73)
-

·编辑与出版·

- 《四库全书》之编纂 (上编) 刘辰 (79)
编纂《北京工业志》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李振兴 (93)
-

·出版管理·

- 独具特色的管理机制——金盾
出版社内部管理机制简介 萧健夫 (101)
人民出版社的管理 陶膺 杨寿松 (106)

·版权与法规·

出版法规管理述略(1949-1993年) 杨维新(117)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调解著作
权纠纷简述 康怡(137)

·电子出版·

我国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
的建立和发展 肖峻峰(140)

·音像出版·

北京市音像出版单位的
兴起和发展 万平(158)

·大事记·

北京出版系统大事记
(1977-1984年) 潘庆海等(163)

·补正·

《新中国出版事业管理机构
的演变》补正 方厚枢(214)

·资料·

“四季”的由来(3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78) 《大清律例》一例(100)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105) 世界知名文学奖及奖金(116) [乾隆]日下旧闻考(139) 《水经》和《水经注》(162) 《世界版权公约》(216)

1977-1979年北京出版界 拨乱反正纪事

□ 方厚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从此结束。北京出版界同全国一样，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同时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书荒”现象初步得到缓解。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20年来出版系统的面貌有了极大的变化。北京地区的出版社从1976年的41家发展到1997年的214家（均不包括副牌出版社），每年出版的图书从1976年的3929种发展到1997年的45,714种。面对今天北京图书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繁荣景象，人们很难想象20年前北京出版界开始拨乱反正时的艰难状况。现把1977、1978、1979三年中出版界发生的往事撷取十件，以飨读者。

一、揭批“四人帮”对出版工作的干扰破坏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出版界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除了各单位通过小组会、大会进行揭批外，国家出版局还进行多次调查研究和召开座谈会，揭批“四人帮”煽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极左思潮严重破坏出版事业的罪行。揭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1）片面强调出书要

“配合当前”，完全“跟着运动转”。运动一来，大家抢着配合；情况一变，撕页、换页、挖改、停售，忙得团团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很大损失。(2) 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大搞文化专制主义。(3) 歪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大搞“古为帮用”，“洋为帮用”。(4) 把工农兵和专业工作者“三结合”写书、编书绝对化，弄虚作假。(5) “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出版队伍，编辑出版队伍受到严重破坏。(6) 无政府主义泛滥，破坏了合理的出版规章制度。(7) 破坏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在“四人帮”的影响下，有的出版社几个“闹而优则仕”的人伸手向党要官要权，由于他们的干扰，党委会经常开成“协商会”，有时简直象联合国的“安理会”，荒谬地强调个人对党的决议要有所谓“否决权”。有家出版社的一个支部负责人公然组织群众批判编辑工作的“三审制”，说它是“修正主义一长制的复活”。一位出版社领导对一部小说中对老干部的描写提出不同看法时，被攻击成“包庇走资派”，是“生活中的走资派包庇作品中的走资派”，并以此为借口竭力反对党委对出书的领导。在“四人帮”乱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影响下，出版社党委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出书，大大削弱了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

二、批判“四人帮”横加给出版界的“两个估计”

1971年国务院委托出版口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插手，对抗周总理，把他们炮制的关于出版战线的“两个估计”塞进了会议的报告。他们胡说“文化大革命”前17年来出版战线是“反革命专政”，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篡夺了”“出版界的领导权”；出版战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也就

是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

1977年5月，中央决定调王匡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随后被正式任命为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两个凡是”还束缚着广大干部（正式文件上还有“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提法）。王匡同志到职后，通过调查研究，认为要纠正出版工作“左”的影响，分清路线是非，扭转出版工作室息、萧条的局面，一定要批判、推倒写入中共中央1971年43号文件中的关于出版界的“两个估计”。而这份中央文件是周总理主持召开的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又是毛主席批示同意颁发的。当时囿于“两个凡是”，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虽多有议论却难以正式提出讨论，而要批判“两个估计”，又必须同周总理区分开。在王匡同志亲自领导下，出版局经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查清了“两个估计”是张春桥、姚文元对抗周总理指示写入1971年中央43号文件的。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12月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王匡同志在报告中着重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正像事前预计的那样，会上也有不同意见，说这样做是否批了毛主席？会后就有人把这件事向上面报告了。当时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负责人曾过问此事。王匡决定以《出版工作情况反映》（增刊）向中央有关领导申诉，说明会议一开始，我们就明确表示要集中批判“四人帮”塞进文件中的“两个估计”，而不涉及整个文件。这次批判产生的余波才算平息。可是，由于当时思想僵化，“个人迷信”盛行，人心思变而又步履艰难。但由于这次批判没有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路线联系起来，因而是彻底的。只有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才将“两个估计”彻底推倒。

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落实人的政策，为被打倒和错误处理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重新安排工作，他们中很多人成为新时期出版工作的领导力量和业务骨干；二是落实书的政策，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封资修毒草”的一大批图书解放出来，重新出版。正是由于在这两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和正确的政策，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书荒”局面。

三、缓解“书荒”第一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被封存停售的图书，据国务院出版口1971年初调查估计有5.76亿册，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封存的就有7870余种共约800余万册。

1978年初，北京、上海的部分出版社少量重印了几种“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文艺书籍。2月23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开始在全市各主要门市部同时发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家》、《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传说》及《哈姆雷特》四种书。这天一清早，就有许多读者闻讯赶到书店门前排队，前门门市部的购书队伍一直排到廊房二条。读者听说到书数量很少，就蜂涌挤进书店。队伍顿时大乱，不得不临时请警察、民兵来协助维持秩序。在王府井门市部早9时开门营业时，购书队伍已排了一千多人。不到一小时就发行《一千零一夜》1400册。在很短时间内，各门市部就将四种书全部售完。新华书店总店迅速将这一情况和广大读者渴求多出书、快出书的愿望向上级汇报。

国家出版局对此事十分重视，2月27日召开办公会议作了专门讨论。王匡同志说：“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一定要抓好。要以新的工作方法干这件事。”会议决定，迅速组织力量

重印一批中外文学作品，并于五一节集中投放市场。3月初，国家出版局召集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出版局和中央级部分出版社负责人开会，安排落实35种中外文学作品重印工作，计划每种印40万至50万册，由13个省、市分工赶印，按计划于5月1日在大中城市同时发行。重点保证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并确定这批图书门市零售数占70%、集体分配供应占30%的比例。

当时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纸张紧张，要马上拿出7000吨纸来印这批书，一时很难解决。这时纸库中存有准备印《毛泽东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一批专用储备纸，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全集》还能不能出，六卷何时能出；不能出的话，这批纸能不能先借用？这可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事。王匡同志连夜赶到中南海，向中央主管文化出版工作的负责同志说明需纸的紧迫情况，要求借用专用储备纸。经同意后，才解决了重印35种中外文学作品的纸张问题。^①

从5月1日开始，35种中外文学作品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集中发行，立即引起了很大轰动。北京全市城近郊区60多个新华书店门市部，成为节日期间最吸引人、最繁忙的地方。王府井门市部在4月30日夜就有近400人彻夜在门外排队等候，到5月1日7时半猛增至二三千人，8时半开门营业时，排队的读者增至四五千人。西单、前门等书店门市部情况也是如此。很多读者“五一”节就是在书店度过的。从5月1日至3

^① 王匡同志在国家出版局任职一年多内，对清查“四人帮”及其在出版局的影响、批判“两个估计”、解决“书荒”、恢复稿酬制度、领导和策划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和出版等做出几项重要决策，他后来曾对宋木文同志谈到当时的心情时说：“看到出版界的同志那么压抑，出版事业那么萧条，我宁愿再一次被打倒也要这样做，也许有人要打倒我的时候我已经去见马克思了。”（见《宋木文出版文集》）

日，仅王府井门市部发行的这批文学作品就达 10 多万册（部）。全市这三天零售发行近 30 个品种共 30 多万册。在这样短的时间，发行的文艺书品种如此之多，在图书发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四、缓解出版工作中的突出矛盾——纸张紧张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教育工作的恢复，发展新出和恢复出版的报、刊、图书日渐增多，对纸张的需要增长较快，而新闻出版用纸每年国家分配数均低于需要数，纸厂实际供货数又低于分配数，因此纸张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1977 年上半年，纸厂欠交的纸张即达 3.8 万吨。各省、市、区和北京地区使用单位的库存纸已基本吃空。由于纸张严重不足，有 20 多个省、区的中小学课本都未印足，大部分一般图书只能满足需要量的 20%，各地对此反映非常强烈。

1977 年 8 月 8 日，邓小平同志在科教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说到：“现在纸张很紧张，而浪费纸张的现象又很严重，有些不必印的东西印得过多，该印的东西却不给印。合理安排很重要。”并提出要把解决纸张问题、出版印刷问题列入国家计划。

国家出版局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在解决纸张紧张问题上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针对当时书刊重复出版和滥编滥印等严重浪费现象，于 1978 年 1 月 12 日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克服书刊内容重复和滥编滥印现象的报告》，除汇报了有关严重情况外，并提出六点改进建议（1）有关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央领导同志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和中央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一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统一供给纸型，分省印刷；各地为及时配合学习，可加印报纸或出版活页文选，今后报刊文章

一般不要汇编成书。(2)除《红旗》、《新华月报》外，其他刊物如无中央通知，不再转载报上已登过的政治文件和社论等文章。(3)胶版纸着重用在供张贴的领袖像上，不得随意挪用。(4)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不得编印图书出售。(5)各单位都不得翻印出版的图书，自行定价公开或内部销售。(6)各地印刷厂不得接受非出版单位复印的图书，如有必需，须经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或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国务院于1月30日批准了国家出版局的报告，并将报告批转全国，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委认真抓一下这个问题，督促有关部门进行一次检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改变。

国家出版局抓的第二件事，是在调查研究后，于1977年10月18日向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写了《关于新闻出版用纸紧张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1978年全国新闻出版部门共申请纸张85.2万吨，轻工业部只能提供56.5万吨，缺口很大。《报告》提出调整供纸计划，缩短供需差距；安排落实造纸的动力和原材料；积极着手改变纸厂管理体制；安排新建项目，增加纸张生产能力等四点改进建议。10月31日，李先念同志作了批示，指示国家计委领导增加生产或进口，解决纸张紧张问题。此后，国家计委、轻工业部分别采取了增加纸张生产和进口部分纸张、纸浆的措施。

1978年，国家出版局继3月重印35种中外文学作品共用纸张7000吨之后，又于6月组织北京、上海等7省、市重印工具书、科技书、少年儿童读物57种，共3200余万册，增拨纸张6000余吨，于国庆节投放市场。这两批书虽然尽了当时最大的可能挤出的纸张，印刷的册数之多是多年来未见的，但仍然只是杯水车薪，发到各地后被一抢而光，没有一种能够摆

在书店供应一个短时期。所以读者还是抱怨“书店无书”。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教材的需要有了大幅度增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各院校扩大招生名额，增招走读生、旁听生、代培生、研究生等，全国新建和恢复了一批大专院校，他们都需要教材；同时，75、76届在校的工农兵学员，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几年来既无教材，又没好好学习，现在急需统编教材发奋自学，这部分需要的数量也很大。二是社会方面，各地区、厂矿纷纷开办各类业余学校，如电视大学、业余大学、技校等，提出的教材需要数也相当可观。据调查，仅大学、中专所需教材用纸即达78万令。由于纸张紧张，读者普遍需要的图书，一般只能按照需要量的20~30%来安排印数，有的只能达到需要量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几。有的出版社反映，如果充分满足供应，一年只出几种书就把全年分配的纸张全部用光。总之，纸张生产的增长速度是算术级数，每年仅增长百分之几，而书、报、刊的纸张需要量则是按几何级数成倍增长。据全国出版社申报1979年的纸张最低需要量为60万吨，而全国计划会议核定只能安排47.4万吨，但是否能按数拿到还是未知数，因十几年来，纸张生产年年完不成计划，缺口越来越大。

随着纸张紧张的矛盾日益突出，印刷紧张的矛盾也跟着困扰着出版部门。印刷落后的问题，集中在印刷技术落后、印刷能力不足与经营管理不善三个方面。

1978年5月22日，王匡同志接到中央调他到外交部工作的通知（后到香港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国务院任命陈翰伯同志为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继任者首先面对的也是纸张紧张和印刷落后两个最大的难题。

1979年1月15日，陈翰伯同志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开门见山地提出：按照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出版部门要全力以赴地多出书、快出书、出好书，“而印刷落后和纸张紧张就像两座大山一样挡着我们的去路。”“要在这两个问题上打个翻身仗，出版工作才能搞上去。”信中简要地列举了存在的主要问题，而其中有些问题不是国家出版局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陈翰伯同志希望能向胡耀邦同志当面汇报，以便提出建议和听取指示。

胡耀邦同志对来信十分重视，不久就召集国家计委、轻工业部、商业部和国家出版局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专门商讨解决纸张紧张的紧迫问题。国家出版局就有关情况和问题及其危害性作了汇报，并提出改进纸张生产及供应的意见和要求，商业部也反映学生作业本无纸可印等情况。胡耀邦同志听后明确指示：教科书用纸必须保证，报纸不可一日缺纸，重要的书刊也要适当安排出版。此事请国家计委牵头，会同有关生产部门务必设法解决。会后，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在1979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调整了新闻出版用纸的生产计划，还特地调拨约1亿美元外汇用于进口纸张和纸浆，使进口纸的数量从1977年的5万吨、1978年的9万吨，猛增到1979年进口22万吨。国家出版局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计划用纸、节约用纸，消除或减少各环节的损耗浪费现象。经过多方面共同努力，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使纸张紧张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

五、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止执行的稿酬制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稿酬制度被全部取消。批判了“两个估计”后，新出和重印的书逐渐增多。完全不付作者稿酬也造成了许多困难。于是，王匡同志决定向中央提出恢复稿酬制度的建议，国家出版局分别征求了有关部门和部分作者对

这一问题的意见，起草了恢复稿酬的办法。

1977年7月17日，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当工宣队后留校任教的同志写信给国务院，说他当工人时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写了一本《板金工下料基础知识》一书（37万字，300幅图），于1976年10月出版后备受欢迎，销路之广，出人意外。信中说，仅有一样令他伤心：出书后“不仅没有分文报酬，反而连招待读者费用，给读者复信费用，也得自己掏腰包。对我一个月薪水仅40.04元的人来说，真不堪负担。本来我还想再写点东西，可我实在无力再写了。”信中还说：“全国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何止千百？其中大多数碍于‘法权’不愿多嘴罢了。”“我请求有关部门考虑稿费问题。……有个300元、400元的就基本上能解决作者的夜宵、笔墨、制图仪器等问题了。”“现在写书，特别是写技术书的人，大部分是‘一锤子买卖’。究其原因，多数是因为没有报酬而力量不足。”

国务院信访室将这封来信转到国家出版局处理，经调查后，了解到《板金工下料基础知识》一书，系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共印30万册。作者原是建筑部门搞通风管道的工人，原有中学文化程度，此书是他和另一位老工人合作编写的。认为来信所提的问题值得重视，于是将来信全文专门编印了一期《出版工作情况反映》上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并送国务院有关部委、国务院办公厅和北京各大新闻单位。

1977年9月2日，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的请示报告》，得到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10月1日起实行。这个办法的特点是根据作品的质量和字数一次付酬，对因抽调写稿而减少收入的工农作者，除稿酬外还给以适当补贴，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按同样标准付酬。虽然实行的是低稿酬制度（著作稿千字2~7元，翻译稿

千字1~5元)，但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稿酬停发了11年的情况下得以恢复，确是突破了一个禁区，是拨乱反正的一项具体成果。

六、恢复和加强新版《鲁迅全集》注释出版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人帮”颠倒黑白，对《鲁迅全集》的注释横加指责、批判，特别对其中关于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一条注释，向周扬、林默涵同志兴师问罪，大加挞伐。《鲁迅全集》被封存禁售，在书店中绝迹。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中央通知国务院出版口，说毛主席要看《鲁迅全集》。通知要用解放后出版的版本排，内容和注释全不动，印成繁体字竖排、大字、线装本，出一本，送一本。出版口于3月份安排印刷，共10卷，每卷10个分册，于4月初出齐。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周总理要送他一部《鲁迅全集》作礼品，但《全集》已成为禁书，不能送外宾，只能送1938年出版的20卷本。经多方寻找，最后从鲁迅博物馆库存的纪念本中选送了一套。作为国家的文学出版社，连鲁迅这样的大作家的《全集》都拿不出来，此事使人民文学出版社深感震惊，更觉得是一种耻辱。考虑新版《全集》的新注释本出版遥遥无期，因此提出重印1938年版无注释本的建议，经上报周总理同意后出版。但出版新注释本的《全集》，仍是出版社的一个强烈愿望，为此作了很多工作并多次向上级建议，国家出版局也多次就鲁迅著作出版问题写过报告，但都被姚文元以“待研究”为名搁置下来，又以“以省注释之繁”为借口，不准对鲁迅著作进行必要的注释。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同志给毛主席写信，信中说：

“近年来，我常想到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著作的注释，鲁迅研究工作的进行等方面，有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也向有关负责同志提过多次建议，始终没有解决，感到实在不能再拖下去，只好向您反映，请求您的帮助。”信中提出了几点建议。

11月1日，毛主席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1976年4月23日至5月10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了《鲁迅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由13个省、市、自治区有关方面分工协作完成。7月1日，国务院将会议的报告批转各地执行。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重大出版任务仍然阻力重重，进展缓慢。毛主席批示下达近两年，新注释鲁迅著作单行本26本中仅出版了2本。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出版局在王匡同志主持下，于1977年9月11日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王匡同志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对编选新版《鲁迅全集》的领导，建议请胡乔木同志过问《全集》的编选工作，掌握方针并对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加以指导和审定；将“文化大革命”中受“四人帮”迫害，现在江西一工厂劳动的林默涵同志调回北京主持编选工作，并借调冯牧、秦牧同志来加强原注释工作的班子；约请郭沫若、沈雁冰、周建人、王冶秋、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周海婴同志担任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顾问。二是确定《全集》收书范围和编选注释原则，除1958年版《全集》的内容外，拟增入全部书信、日记，辑录古籍和译文的序跋，以及1958年以来所发现的全部佚文，并附鲁迅年谱和注释索引于末卷。新版《全集》注释以1958年版为基础，原注释凡能用的尽量采用，错误的加以改

正，不足的加以增补，繁琐的加以删减，体例不一的加以统一。总之，力求准确、简明、通俗易懂。

国家出版局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在胡乔木、林默涵同志的领导和主持下，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进度大大加快，进展顺利。有注释的增订新版《鲁迅全集》（16卷）终于在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前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的注释有2.3万多条，近240万字，比1958年收的《全集》大为增加。这也是出版工作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

七、“迎接少儿读物繁花似锦的春天”

“四人帮”造成的“书荒”严重，少儿读物更是一片荒芜，引起各方面强烈的反映。1978年5月初，国家出版局邀请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出版社座谈少儿读物的出版问题。与会同志反映，目前少儿读物奇缺，必须引起严重注意。1954年团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儿读物“奇缺”，那时全国有阅读能力的少儿是7000万，出版图书400种，而现在少儿已有两亿左右，1977年仅出版少儿出版物192种。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数学游戏》，王府井书店两小时内就销售了15万册，低幼读物《小马过河》出售时排队的人山人海，一抢而空。由于少儿读物少，青少年课外无书可读，不少海淫海盗的手抄本流传开来，严重地毒害着他们。会上还谈到，由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不少人至今心有余悸。如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讽刺说假话，意思很好，儿童也爱看，但被否定了，现在能不能重印还有些踌躇，怕被人说有“影射”寓意。《龟兔赛跑》故事家喻户晓，但被批判为“宣扬爬行主义”，至今还不敢重印。

5月28日，国家出版局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召开少儿读物作家座谈会，全国妇联副主任康克清同志和中宣部、国